



站在广西左江流域的喀斯特峰林之间，湿热的风裹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这里夏季漫长，炎热湿润，植被繁茂，石山林立，江河蜿蜒。今天，曾经的荒野已然成为家园。而数万年前，当人类踏上这片土地，他们要怎样生存？

201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调查团队，在广西壮族自冶区崇左市扶绥县发现了吉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并联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在此展开了长达7年的考古工作。相关新成果引起广泛关注。遗址群的代表遗址——吉到1号，地层年代跨越距今3.6万年—0.8万年，发掘出多处墓葬和丰富的用火遗迹，出土了1000余件人类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和动物碎骨，大量淡水螺蚌壳，以及数百件赭石、植物种子等丰富遗存，是

中国是海洋大国，海洋类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数量众多。今年10月，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广东汕尾晨洲蚝养殖系统赫然在列。这是全国首个以海产养殖为核心要素的项目，为中国人“耕海牧渔”的传统智慧写下注脚。

牡蛎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温带至热带海域的经济贝类，“蚝”是其在华南地区的俗称。牡蛎有“海中牛奶”之称，人类采食的历史可追溯至石器时代。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年发布的公告，全球共有44个国家养殖牡蛎，其中中国为最大生产国，产量在全球占比高达85%。

广东地跨热带和亚热带，濒临南海，历来是我国海洋渔业重地。珠江口一带人工养蚝历史悠久，宋代已有记载。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三《介语·蚝》，记录有蚝的生物学形态、命名由来、蚝田种养法、“天蚝”“人蚝”之别、打蚝歌谣及工具、蚝壳屋等内容，由此足以管窥广东沿海蚝养殖系统的深厚价值。

晨洲蚝在物种上属于香港巨牡蛎，虽定名较晚，却为广东沿海地区自古养殖的品类。蚝苗取自天然海域，其优良性状由环境塑造，而非遗传选育得来。蚝以浮游生物为食，养殖无需人工投喂，这无疑非常考验蚝农对江海水的管理和利用。

晨洲的“万亩蚝田”由数以百计的“塘”和“塍”拼组而成，面积小的称作“蚝塘”，百亩以上的大多称作“蚝塍”或“鱼塍”。蚝塍选址于淡水经常流入的内湾近陆地带，干潮线以上的滩涂地区。蚝民通过人工筑堤、开沟设闸以贮蓄海水，利用潮水涨落纳进或投入蚝苗进行养殖。塍中的水质受到淡水流入的调节，水质肥沃、海水比重适宜，有效避免了自然海域中的剧烈潮汐变化和污染冲击，在稳定水质的同时，也能补充天然饵料。针对不同水域环境，蚝民因地制宜：浅海潮汐频繁、水域开阔，采用水泥柱、浮台和插竹等多种方式养殖；塍塘为蚝的育肥区，水位较浅，水流平缓，则多采用插竹吊养。蚝塍大多兼养鱼虾（种苗来自江海水），如此既增加了水体有机质，为养蚝提供饵料，又能提高整体养殖收益。等到冬季收完蚝后的“晒塍”，塍沟中的水依然可以供鱼虾生长。

晨洲村原为海上一孤岛，居民以蚝为生已有3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村民依然是蚝农。论养殖水平，老村支书黄智明是佼佼者。在他看来，水质、盐度、季节、降雨、风、潮汐、滩涂地结构等，都可能对蚝的生长产生不小的影响。黄智明的塘和一位年轻蚝农的塘紧挨着，面积也一般大，产量却能多两三倍。耕海牧渔，同样需要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不需要肥料、饲料等外部投入的晨洲蚝养殖系统，运行之效全在于蚝农对生态条件的科学驾驭，传统技术和知识之珍贵，于此益彰。



晨洲村附近的蚝农在开蚝。李杏子摄

玻璃陨石：岭南先民的“生存利器”

刘颖杰 邢 松

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史前墓葬群，也是我国迄今发现人类化石数量最多的旧石器遗址。

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一批特殊的文化遗物——1.5万余件以玻璃陨石为原料的石制品。这些黑色半透明的小石头，为解码左江流域先民的石器技术和生存方式，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玻璃陨石虽名中带有“陨石”二字，但它并非真正的“天外来物”。距今约70万年前发生过一次陨石事件，地球表面沉积物在撞击中被熔融、抛射，随后冷却，形成了天然硅酸盐玻璃体，散落在我国东南沿海至南亚、澳大利亚一带。玻璃陨石形状多样，包括水滴状、球棒状、哑铃状、球状、圆饼状和不规则块状等，大小从几毫米到十几厘米不等。其摩氏硬度为6.5—7，断口呈贝壳状，非常锋利。凭借这一特性，在数万年至几千年前的岭南，玻璃陨石成为先民珍贵的生产资料 and “生存利器”。

玻璃陨石制品在遗址的各自然层都有出土，在三个文化期中，玻璃陨石制品在石制品中的占比分别为94.7%、98.4%和89.7%。

使用这种石料制作工具并不容易：玻璃陨石原石的体积较小，难以握持剥取石片，采用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多细碎，很难被加工

利用。实验表明，先民使用砸击法，将玻璃陨石置于石砧上，一只手固定石料并调整位置和角度，另一只手挥动石锤向下砸击剥取石片。这需要精准控制力道，因为玻璃陨石脆性很高，每一次打击都会在其内部产生裂痕，剥片动作必须精、准、狠，在有限的次数内完成，否则原石便会崩碎。另外，若砸击时角度和力度不当，大量飞溅的细小尖利碎屑会伤及打制者和他人。只有在剥片前进行合理预设，进行一次恰到好处的砸击，才能够获取一块大小适中、边缘薄锐的石片，这样的石片无需修整或仅进行简单修整，就可以使用。

吉到1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工具类型多样，包括刮削器、有肩钻器、凹缺器等，能实现刮削、切割、穿刺、钻孔、刻划等多种功能，可见此地先民对玻璃陨石的特性和打制技巧已经完全掌握。出土石制品很多边缘带有小凹槽，表明它们可能与竹、木等材料进行捆绑，制成复合工具，弥补其体积较小、仅靠手持使用难以实现多种功能的缺陷。

从时间跨度来看，在吉到遗址群，玻璃陨石制品从距今3.6万年延续至距今0.8万年，贯穿了末次盛冰期前后。在新石器时代的冲塘、顶狮山等遗址，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玻璃陨石制品，表明这套石器传统并未中断，而是稳定存续。

从地域广度来看，放眼整个岭南地区，左江流域的冲塘遗址，右江流域的娅怀洞遗

址，邕江流域的顶狮山遗址，柳州的风岩遗址，远至海南的落笔洞遗址，都有玻璃陨石制品的身影。从广西山林到南海之滨，玻璃陨石被岭南各地的先民拾取、利用。

中国北方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到距今约2.8万年至2.6万年时，东北、华北地区都出现了细石叶技术遗存。此后，细石叶技术迅速扩散，在中国北方乃至青藏高原地区全面落地，并在新石器时代继续被使用。相比之下，岭南的玻璃陨石制品只是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远不如石叶、细石叶规范精美。那么，这种有些“简陋”的石制品，为什么能在岭南延续数万年而不被取代？

“简陋”的背后，是另一套生存逻辑。玻璃陨石作为一种优质石料，完全具备加工成细石叶或其他精致石器的技术潜力，但岭南先民没有这么做。其原因或许在于“不需要”。岭南丛林密布，河网纵横，动植物资源丰富。既有的工具组合足以应对日常需求，先民缺乏开发更复杂技术系统的压力与动力。如果说细石叶遗存代表了处于高度流动状态的北方先民的“求变”，那么玻璃陨石制品则代表了处在稳定气候环境下的南方先民的“守常”，两种策略体现了远古先民应对多样环境的不同生存智慧。

数万年间，看似简单的工具，支撑着先民们走过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漫长里程，也成为解读岭南远古生存法则的一份独特样本。



2025年西阴遗址出土的高圆足彩陶盆。周飞亚摄

深秋10月，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山西运城开幕。数百名学者共赴这场中国考古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为期3天的热烈研讨，绕不开一个词：西阴。

整整100年前，正是在运城夏县西阴村的灰土岭上，30岁的李济掘下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翻开新篇章。

当年的西阴遗址，发掘面积很小，却创下了4个“第一”——

第一次运用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对每件出土遗物进行三维坐标记录。这是中国考古界首次以地层学为基础的发掘尝试。精细化的发掘与记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基础规范。1927年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成为我国第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发掘现场图、探方遗迹平剖图、出土器物线图、陶片统计表等奠定了考古报告的基本模式。1930年，梁思永根据此次发掘的标本，写出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第一次运用类型学对国内考古资料进行整理研究。而发掘开始前，李济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拟定的《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涉及权限、发掘品归属、文物展览，亦是我国第一部考古发掘管理制度。

十六国北朝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据峭函之固、拥沃野之饶，又控扼丝绸之路东端，成为竞逐与会聚之地。匈奴、氐、羌、鲜卑等族群相继在此建立政权，他们在承袭中原礼乐传统的同时，也把西域胡乐引入上层社会与郊庙祭祀，形成“以胡入雅、胡风汉韵”的独特音乐风貌。然而，这一时期乐制沿革的记载向来简略，近年来，关中地区大批十六国至北朝墓葬中乐俑的出土，为复原当时的乐队组合、乐器嬗变提供了珍贵资料。

关中地区已发现的十六国至北朝墓葬中，出土乐俑者已有数十座，集中于咸阳原、凤栖原、少陵原及高阳原一带。各类乐俑总数400余件，包括奏乐的伎乐俑、军仪出行的鼓吹俑，以及不持乐器、只作唱念或击掌等姿态的姿态俑。

咸阳市里村前秦早期墓葬M63共出土乐俑31件，其中伎乐俑所持乐器分吹、弹、击三类，吹奏类有排箫、笙、笛，弹奏类有琵琶、瑟、箏、筑，击奏类则均为鼓；姿态俑或说唱，或击掌，或领奏，与奏乐者共同构成完整的表演场景。透过这一组合可见，十六国贵族阶层音乐文化中，商周至西汉时期常见的钟、磬等礼乐器已彻底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丝竹管弦乐器，而箏、瑟等中原乐器仍居要位。此种以丝竹管弦之乐为主、华夏旧器为骨干的格局，延续了汉魏清乐传统。《隋书·音乐志》云：“清乐其始即清

可以说，中国考古科学化，由西阴发端。

而要真正读懂西阴，还得回到仰韶。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问”。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命名仰韶文化，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然而，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断言中国彩陶源自西方。彼时，国势衰微，此说风行，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华文明“自他邦而来”。当时的有志之士，都想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1926年3月，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汾河流域进行史前人类遗迹调查，在西阴村发现“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于是有了西阴遗址的首次发掘。

发掘有两样珍贵收获。其一是半枚人工切割的蚕茧，虽已炭化，切割处却极为平直，把中国人植桑养蚕的历史推到约6000年前。其二是绘有圆点、弧线、三角等纹样的彩陶，李济将其命名为“西阴纹”。它们以实物发出宣告：中华文明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源远流长，自成体系。

1994年，西阴遗址迎来第二次发掘。这一次，学者们厘清西阴遗址包含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岗文化等多期遗存，建立起该区域史前文化序列，西阴文化被正式命名。2025年至2026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西阴第三次发掘启幕。这次发掘，摸清了西阴遗址的分布范围，探明了仰韶时期的双重壕壕轮廓，先民如何规划聚落、划分功能、组织防御，有了清晰线索。多学科考古全面铺展开：浮选获得的粟、黍等植物遗存，鉴定出的猪、狗、鹿等多种动物骨骼，揭示出家畜饲养与狩猎采集互补的业；拉曼光谱确认彩陶颜料为赭石；小口尖底瓶的残留物里发现红曲霉菌和酵母，证明5000

多年前的先民已同时掌握曲酒与谷芽酒两种酿造技术……

西阴遗址所在的夏县，古称安邑，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禹都——夏县之“夏”，正得名于夏文化。传说黄帝元妃嫫祖教民植桑养蚕于夏县，后人在灰土岭上建有嫫祖庙，每年都会举办庙会。当年西阴出土的那半枚蚕茧，曾长期受到质疑，而近年来，西阴村以及河津、闻喜、芮城等地多个同时代或稍晚时期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石雕或陶制茧蛹，为晋南作为中国丝绸起源核心区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为什么晋南地区有这么多仰韶时代的大遗址？先民为什么选择这里定居，并发展出以西阴文化为代表的灿烂文化？随着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答案逐渐清晰——盐和铜矿。

运城盐池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池盐产地，稳定的盐业资源为大规模人口聚集和定居提供了必要条件，是史前文化繁盛的重要物质基础。盐池保障了早期族群的生存与财富积累，诱发了社会复杂化；随着文明持续演进，中条山铜矿的产出则为夏商早期国家提供了核心战略物资，支撑了礼制文明的运转。

东依中条山，南距盐池20多公里的西阴，无疑是晋南与中华文明起源课题中一个醒目的坐标。

一处遗址，三次发掘，跨越百年。西阴遗址的三次考古发掘，恰好落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学科体系成熟、文明探源深化的三个关键节点上。小小的西阴村，因此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征程。如今，距离遗址数公里处，造型如蚕茧的西阴考古博物馆也已完成布展，即将对公众开放。百年西阴和中国考古学的故事，仍在不断续写新篇。

近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作为“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这份《规划》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锚定2030年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目标，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治理迈入全新阶段。

城市文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守护好中华大地的城市文脉，就是守住中华文明不可再生的历史根脉，这是《规划》部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重点关切。《规划》的突出特点是系统性完备，首次在国家层面为文化遗产全领域搭建起完整工作框架，打通了从资源普查到督察问责的治理链条，打破了不同条线分头治理的工作壁垒，为跨区域、跨领域的重大保护项目提供了顶层支撑。第二个特点是专业性突出，提出了线性遗产和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等中国特色方案，明确要求在城乡建设中落实“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等文物保护前置要求，在对接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了适配中国文化根脉特质的保护路径。第三个特点是指导性明确，重点、节点明确可落地，设置两次评估考核，形成“部署、推进、考核、问责”的完整工作闭环，为各地各部门推进相关工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攻坚方向是通过细化分类保护，补齐历史城市、历史街区“应保尽保”的突出短板。经过多年持续推进，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超过14万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6座，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00余项，涵盖主要类型的保护体系已见雏形，成绩显著。但对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仍然存在“覆盖不全、认定滞后”问题。《规划》提出强化分类保护，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历史上的都城、府城、州城、县城、县城等古城，是对此的有力回应。目前我们的保护力度仍显不足。比如在东部某省105座历史上的府城、县城中，75座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城格局与历史风貌，但仅有8座被纳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名录。这直接造成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大量尚未被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街区之存续面临风险。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保护认知偏差，不少地方将文化遗产保护等同于“申报—获批”的荣誉性工作，把保护当成向上争取的“奖励”，而非必须落实的法定责任和必须守牢的文化安全底线。之所以存在这种“重申报、轻普查，重挂牌、轻兜底”的认识误区，在于未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因此，做好“应保尽保”，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

补齐“应保尽保”的短板，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规划》落地机制。首先，要提高保护认识，从国家文化安全高度看待全域保护工作，明确所有承载城市历史脉络的空间遗存都具备保护价值。其次，要细化识别标准，将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特征的环境要素均纳入整体保护范畴。再次，要完善分级保护体系，解决保护标准模糊、管控措施粗放的问题。最后，建立全覆盖、动态更新的保护清单，形成标准化、可统计、可管控的对象名录，让所有历史遗存“有据可查、有规可依、有策可保”。

《规划》在保障机制上也有诸多亮点。例如，《规划》首次在中央文化层面明确提出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文物古迹保护，受到行业瞩目。从国际成熟经验来看，英国、欧盟等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早的国家和地区，早已将15%左右的彩票收入定向用于各类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一政策的推出，将从实施层面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更加多元的资源投入新格局。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的实物见证，是不可再生的文明根脉。《规划》的落地实施，将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迈入系统性保护新阶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周飞亚

长二尺”。高昌处于河西通往西域的要冲，与关中存在持续不断的军事与人口往来。角可能正是伴随十六国时期的战争所引发的人口流动而传入关中，并广泛用于军乐鼓吹。

无独有偶，与角同属鼓吹系统的羯鼓，也透露出同样的信息。西安等驾中村M3出土的羯鼓，其形制与演奏方式同甘肃高台地坡坡魏晋墓M4壁画中的羯鼓近乎相同，印证了关中与河西之间的音乐互动。角主吹鸣、羯鼓司击节，二者一吹一击，其早期形态均可追溯至河西、西域一带，这恰为鼓吹伐伎乐而起这一现象提供了注解。

无论是高昌之角，还是龟兹之竖篳篥，其东传都与吕光西征事件密切相关。《太平御览》载“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乐，记有竖篳篥”。咸阳坡刘村M2出土演奏竖篳篥乐俑，是迄今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乐俑中仅见的一例，为以竖篳篥为代表的西域乐器东传路径补充了关键一环。

回望这段历程，关中地区十六国北朝音乐文化并非“汉乐衰、胡乐兴”的单向替代，而是层层累积的演进。汉魏以来的中原音乐并未因战乱而断绝，异域乐器亦随人口迁徙、丝路交往不断涌入关中，不同地域、族群的音乐因素长期碰撞、彼此吸纳；新乐器与旧有传统重新组合，呈现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崭新面貌。关中乐俑所呈现的，正是不同文化相遇之后的吸收、转化与再创造。